

“黑人伊斯兰教”

——殖民时期法国学者的西非伊斯兰教研究

李维建^①

法国西非殖民政府对西非伊斯兰教的态度，从开始的恐惧对抗，到有限合作，直至最后发展为与苏菲教团结成政治、经济利益的共同体。这种政策转变的背后，是法国政府对西非伊斯兰教看法的转变，而政府看法的转变又源自法国相关学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的调查和研究结论。

法属西非成立之初，出于殖民管理的需要，殖民政府根据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历史中所获得的对非洲伊斯兰教的初步认识，来管理西非的伊斯兰教。殖民官员逐渐发现，阿尔及利亚模式使他们日益陷入困境，整日生活在伊斯兰教恐惧阴影的笼罩之下。将治理北非的经验用于西非，显然“水土不服”。殖民官员发现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加强对西非伊斯兰教的调查研究，以客观的研究结论指导殖民管理。为此，殖民政府开始将研究构想付诸实施。首先建立相关体制，成立调查研究机构。1906年，达卡尔的殖民地总督要求各地的副总督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以政府公报的形式汇报当地的伊斯兰教情况。1913年，殖民政府内部成立了“穆斯林事务服务局”（*Serive des affaires musulmanes*），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伊斯兰教相关情报，进行分析研究。巴黎政府内部也增设了“穆斯林事务部际委员会”，以“决定穆斯林政策，寻求各部之间有关穆斯林问题的共同解决办法”^②。其次，组织大量对伊斯兰教的调查。总督要求各级殖民官员负责在本管辖区域内的调查研究，另外政府还组织专项调查，如组织对冈比亚地区伊斯兰教的调查。为确保资料真实有效，这次调查由殖民官员监督，调查员全部由当地穆斯林充任。第三，殖民政府重用一批学者型官员，或有意任命相关学者为殖民地高



① 李维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非洲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

② Christopher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5.

官。在殖民政府内部，不论是达卡尔的总督府，抑或各殖民地的副总督府，都有伊斯兰研究学者被委以重任。多位学者型官员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并推出其相关研究成果的。这些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弗朗索瓦·克洛塞（François Clozel）、莫里斯·德拉夫斯、保罗·马帝（Paul Marty）等人。

一、早期的西非伊斯兰教研究

路易斯·宾格（Louis Gustave Binger, 1856—1936），法国探险家和非洲伊斯兰教研究专家，曾任法国殖民地部非洲局局长（1902—1906）。他根据自己在非洲探险和执政中的观察，留下三本有关西非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著作。第一本是他的游记《从尼日尔河到几内亚湾：在康国和莫西国的旅行》^①；第二本书讨论西非伊斯兰教的奴隶制度，作者认为伊斯兰教的奴隶制度与欧洲奴隶制度差异巨大，非洲奴隶的地位比巴黎的失业者还高；第三本书名为《伊斯兰教之祸》^②，书名有点吓人，但此书内容却是建议法国政府在西非宗教问题上应该持中立立场，避免深入介入伊斯兰事务；随着铁路的延伸和世俗学校的扩展，非洲伊斯兰教最终会衰退。宾格以典型的世俗化观点在分析他所看到的伊斯兰教。

科波拉尼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作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官员，法属西非将科波拉尼作为人才引进，希望他能够凭借在阿尔及利亚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经验，和平解决法国人与摩尔人和图阿雷格人的冲突，控制这一地区。他为此专门调研，写出一份关于该地区伊斯兰教的调研报告。从报告内容看，科波拉尼虽然认为苏菲教团可形成“国中之国”，但总体上他对伊斯兰教持乐观态度，认为西非穆斯林对外来者非常友好，不同意殖民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怀疑态度。在他其他的调研报告中，他仍坚持这一观点。1902—1903年，在巴黎短暂停留期间，他与他人合办了一本学术杂志《撒哈拉以南法国穆斯林评论》（Revue Franco-Musulmane et Saharienne）。该杂志共出版13期，促进了西非伊斯兰教的研究。1905年5月，科波拉尼在调查途中被穆斯林袭击身亡。在大部分殖民官员看来，科波拉尼的突然被杀，等于科波拉尼以自己生命证明他的“西非伊斯兰教不反

① Louis Gustave Binger, Du Niger au golfe de Guinée par le pays de Kong et le Mossi, Hachette et cie, 1892.

② Louis Gustave Binger, Le Péril de l'islam, Paris, Comité de l'Afrique française, 1906.

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

罗伯特·阿诺德对伊斯兰教的研究。罗伯特·阿诺德起初任科波拉尼的“伊斯兰教研究”助手，同时也是他的学生。阿诺德 1873 年生于阿尔及利亚，懂阿拉伯语，1898 年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政府里任副署长。同年底被调往西非任科波拉尼的研究助手。1906 年，他出版《穆斯林政策简述》^①。该书以对塞内加尔河北岸的摩尔人调查为基础，提出处理伊斯兰教相关问题的政策建议；本书讨论了伊斯兰教的历史和教义，认为苏菲主义属于正统伊斯兰教，殖民政府在对待重要的苏菲长老时应该“格外谨慎”；阿诺德对西非的两大苏菲教团作了严格的区分：卡迪里教团心胸开阔，乐善好施，提加尼教团则心胸狭隘，崇尚暴力。他最终提出两点建议，对后来法属西非政策影响深远：一，殖民政府应该关注西非伊斯兰教的特殊性，它与北非伊斯兰教有巨大的差异；二，殖民政府应该利用苏菲教团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以镇压、限制为主。阿诺德写有大量调查报告，此外还发表过研究论文，如《法属西非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政治》（*L'Islam et la politique musulmane française en Afrique occidentale*）等。阿诺德对西非伊斯兰教的认识，要比他的前辈深刻、现实得多。他的研究前承学者们对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的共识，后接“黑人伊斯兰教”的学术观点。

威廉·庞帝（William Ponty）。此人在镇压萨摩里的“吉哈德”伊斯兰运动^②中开始得到重用，后来先是任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殖民地的副总督，后于 1908—1915 升任法属西非总督。他在任期间致力于西非的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同时，对伊斯兰教也颇有研究。不过他并无研究成果出版，他对伊斯兰教的调查和研究主要包括在其大量政府公报、私人信函和调查笔记中。这些资料现大都存放在法国及西非相关国家的档案馆中。庞帝在非洲殖民地有长期的生活经历，他对西非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其中包括伊斯兰教。他认为，奴隶制度是认识西非近代伊斯兰教的钥匙，18—19 世纪的伊斯兰“吉哈德”运动利用大量的奴隶劳动才得以成功（奴隶占当时社会总人口的三分之二）。^③他认为苏菲教团的力量来自于马拉布特与部落酋长的联盟，西非伊斯兰教是《古兰经》思想与当地本土信仰的“混合”宗教：“我们的穆斯林并未全部接受《古兰经》，他们总



① Arnaud, Robert, *Précis de politique musulmane*. 1906.

② 19 世纪西非一次伊斯兰教宗教武装运动，由萨摩里领导，被法国镇压。

③ Christopher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0.

是希望保留自己祖先的风俗。”^① 庞帝任总督期间，正是“伊斯兰恐惧”大行其道之时，他总体上对西非伊斯兰教持否定态度。在他之前，殖民者普遍认为，不管伊斯兰教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它总体上仍是西非社会的一种积极因素，他却认为在伊斯兰教“伪善的面孔下，掩盖的却是特权集团的自私，以及对公平、自由等现代文明的阻碍的最后企图”^②。这与科波拉尼对伊斯兰教的看法相距甚远。

二、殖民时代西非伊斯兰教研究的高峰：弗朗索瓦·克洛塞、莫里斯·德拉夫斯、保罗·马帝

1. 弗朗索瓦·克洛塞

克洛塞，1860年出生于法国阿尔代什省，1881—1882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随后在阿尔及利亚工作。1892年始，克洛塞先后到中部非洲、阿达马瓦（Adamawa）和乍得等地探险考察。1896—1906年在象牙海岸任殖民官员，1901年起任象牙海岸殖民地副总督。

1901年，克洛塞以副总督的身份向下级官员发布手令，要求在各自的辖区进行详尽的人类学调查。1902年，克洛塞将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和分析，以《象牙海岸的风俗》^③为名出版。从这部书看，克洛塞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与理解仍以正面为主，但同时，他“发现”了原本无人知晓的、发育良好、体系完整的西非本土信仰——万物有灵论。这一“发现”一度使他失去对伊斯兰教研究的热情。

1908年，克洛塞任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殖民地的副总督。在此期间，他发现，迪尤拉穆斯林商人除高效地传播伊斯兰教外，对法国摧毁他们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制度仇恨在心，时刻要报复法国人。他同威廉·庞帝一样也发现，西非伊斯兰教其实是“混合”的宗教。他还发现西非伊斯兰教与奴隶制度存在共生关系：奴隶制盛行的非农业区是伊斯兰教最为繁荣的地区。

1911年，克洛塞又一次利用他的行政权力，要求其下属对本辖区内的伊斯兰教进

①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 (ANS), 15 G 103, Gov.-Gen. AOF to Lt.-Gov. Haut Sénégal et Niger, Aug. 1911.

②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 (ANS), 19 G 1, Gov.-Gen. AOF circular, 26 December 1911.

③ François-Joseph Clozel, Les Coutumes indigènes de la Côte d'Ivoire. A. Challamel, 1902.

行调查，并汇报调查结果。最有意思的是，在他这次发布给地方殖民官员的命令中，克洛塞部分地回答了现代人非常不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西非，伊斯兰教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克洛塞认为，法国人破坏了西非本土信仰的部落社会结构，致使非洲人的偶像崇拜衰落或消失，为伊斯兰教清除了障碍。他说：“偶像崇拜者构成的社会，其酋长被驱逐了。这样的社会无力清除穆斯林的影响，无法对抗马拉布特和迪尤拉穆斯林的宣教活动。马拉布特们和迪尤拉人以我们的辅助者自居，用甜言蜜语式的劝诫，逐渐赢得了如同穆斯林以武力传播宗教一样的效果。”^① 这种观点后来被著名伊斯兰教研究专家斯宾塞·崔明翰所继承。^② 他还进一步发现，殖民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限制政策，反而进一步促进了穆斯林的团结，使其宣教效果大增。他认为在外界的压力下，“不但各民族穆斯林之间的竞争会消失，而且穆斯林最终会形成一个超越民族分歧的共同身份。宗教理想会将过去彼此分离的集团凝聚起来。因此可以说，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偶像崇拜社会的解体，另一方面也见证了穆斯林从法国征服运动所导致的社会转型中所得到的好处：穆斯林的团结”^③。面对伊斯兰教咄咄逼人的态势，克洛塞建议以恢复非洲传统宗教，而不是大力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以作为扼制伊斯兰教的手段。他说：“以统一且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偶像崇拜信仰对抗入侵的伊斯兰教，这是我们殖民地本土政策的关键。”^④ 因此，殖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止西非万物有灵论社会的解体，他建议以当地的习惯法取代伊斯兰教法，作为殖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法律，“你会意识到我们的非穆斯林居民是多么依赖他们祖先的传统。仔细研究之后，就也会知道这些传统是多么具有逻辑性，多么公正，多么令人肃然起敬……这些风俗传统是万物有灵论的基石。我们应该以这些传统为中心，将面临崩溃的西非社会中已被打散的传统元素统合起来”^⑤，用以对抗伊斯兰教。即使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克洛

①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 (ANS), 15 G 103, 'Circulaire au sujet de la politique musulmane dans le Haut-Sénégal et Niger', 12 August 1911.

② J. Spencer Trimingham, *Islam in West Africa*. Oxford Press, 1959, p.29-30.

③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 (ANS), 15 G 103, 'Circulaire au sujet de la politique musulmane dans le Haut-Sénégal et Niger', 12 August 1911.

④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 (ANS), 15 G 103, 'Circulaire au sujet de la politique musulmane dans le Haut-Sénégal et Niger', 12 August 1911.

⑤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 (ANS), 15 G 103, 'Circulaire au sujet de la politique musulmane dans le Haut-Sénégal et Niger', 12 August 1911.

塞对西非宗教兴衰原因的分析，以本土宗教为外来宗教的天然防火墙作为抵御伊斯兰教快速扩张势头的建议，是非常正确和深刻的。

克洛塞对西非伊斯兰教的研究，基于他宗教人类学的偏好，特别注重不同民族所承载的伊斯兰教之间的特质与区别，他的许多文章都在试图探索这种区别。例如他认为，苏丹地区的沃洛夫人生性自傲，信仰虔诚，对殖民政府构成潜在威胁；索宁克人和富尔贝人虽然有信仰狂热，却易于收买；至于桑海人和摩尔人的宗教狂热，法国人的世俗教育就可解决；对宗教信仰淡漠却好战的图阿雷格人，可考虑把他们招进法国军队，为殖民政府所用。

克洛塞继承了前辈学者关于西非伊斯兰教具有西非本土特性的观点，并将这种特性具体化到西非主要的穆斯林族群。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特色，将宗教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终于使它的学术研究获得重大突破：西非本土宗教才是伊斯兰教最强劲的对手，而非基督教和天主教。

2. 莫里斯·德拉夫斯

德拉夫斯，1870 年生于法国中部。曾经进过修道院，学过医学。他反对非洲奴隶制度，年轻时立志要到塞内加尔作教师，为此苦学阿拉伯语。1890—1891 年在撒哈拉沙漠中志愿从事废除奴隶制度的工作。1892 年开始学习豪萨语。1894 年他通过宾格的关系，到象牙海岸殖民政府中任职。正是在这里德拉夫斯与克洛塞一起开始民族学和宗教学研究。德拉夫斯不但是法国反奴隶制委员会的成员，还成长为当时著名的民族学家。

1908 年，德拉夫斯返回巴黎，在“殖民地学校”^①教“非洲语言和文化”课程。任教期间，他发表了三篇论述非洲伊斯兰教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宗教持中立立场。他认为，伊斯兰教对“黑非洲”的影响要比天主教和基督教更好，黑非洲欧洲化不是个好选择。穆斯林对法国殖民政府的威胁并不比本土的万物有灵论者更高，因为二者都对法国的殖民统治持同样冷漠的态度。他同样也谈到“混合”伊斯兰教问题。西非的伊斯兰教是正统伊斯兰教与本土宗教的混合体，西非苏菲教团的组织性和力量都远不及马格里布。

^① 法国政府在巴黎设置的以培养殖民地官员为主的学校。



1912年，德拉夫斯出版了三卷本的《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①，这是一本记录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国家、居民、语言、历史和文明的民族人类学著作，其中辟有专章研究伊斯兰教。关于西非宗教，此书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德拉夫斯承接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利·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观点，认为如果从中立的角度看，西非的本土文明，包括宗教，与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一样，也是一种文明形态，只是其历史、形态、作用机制不同，但本土文明对于西非居民的作用与基督教之于欧洲人和美国人是类似的。二，万物有灵论信仰与西非地方社会制度相结合而构成的西非文明所产生的社会力量与世界观，是西非伊斯兰信仰和体制所缺乏的。因为西非根本不存在纯正的伊斯兰教。西非居民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不可能全部接受伊斯兰教法，不可能以安拉信仰彻底取代万物有灵论。三，在西非，既没有理由支持伊斯兰教，也没有理由限制伊斯兰教。虽然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西非万物有灵信仰，不能因此就认为它的社会或政治影响大于万物有灵论。四，对于西非居民选择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都不要进行干涉。如果西非居民不断完善他们的本土信仰，信仰自己的本土宗教，这可能对他们自身，对殖民政府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对于法国官方来说，德拉夫斯的观点过于学术气和理想化，当然不会采纳。但是，这种颇具启蒙意识、人文关怀和文化情怀的思想，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已成为当代学术界的共识，现代文明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模板。

3. 保罗·马帝

保罗·马帝（1882—1938），生于阿尔及尔郊区，19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不久即在突尼斯的法国殖民政府中任职。直到1911年，他都在北非殖民政府中任翻译，顾问等职务。1912—1921年，任西非达卡尔殖民地副总督的穆斯林事务顾问，直到升任军事高级翻译，并被授予荣誉军团的爵士。此后，他又回到北非。1922—1925年任非斯穆斯林学院院长。1926年转到拉巴特，在本地事务部任职，1930年升任该部部长。1935年到突尼斯军队的最高统率部任职。1938年在突尼斯军事医院逝世。马帝出身卑微却履历辉煌，他后世留名却是源于在达卡尔的人生经历。在西非期间，作为志趣相投之人，他与庞帝、德拉夫斯等人都有交往，并结下深厚友谊。

马帝著作等身，主要涉及北非和西非伊斯兰教研究。关于西非伊斯兰教研究的著

^① Delafosse, M. Haut-Sénégal et Niger. 3 vols., Paris, 1912.

作，主要如下：《阿玛杜·邦巴的穆里德教团》^①；《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②；《特拉扎酋长国》^③；四卷本的《伊斯兰教和苏丹部落研究》^④；《几内亚的伊斯兰教：富塔贾隆》^⑤；《摩尔人的伊斯兰教研究：布拉克纳》^⑥；《科特迪瓦伊斯兰教研究》^⑦；《达荷美伊斯兰教研究：上达荷美，下达荷美》^⑧；《摩尔人伊斯兰教研究》^⑨；《塞内加尔研究》^⑩；《上毛里塔尼亚部落》^⑪；《尼日尔河湾的图阿雷格人》^⑫。此外他还有大量的通信，以及他起草的研究报告、文件等，都涉及西非伊斯兰教的研究，或表达他的学术观点。

马帝认为西非伊斯兰教是以苏菲主义为体现形式的伊斯兰教，“与其说表面上是信仰安拉的宗教，不如说是马拉布特主义”^⑬。因此完全可以说，西非伊斯兰教是正统伊斯兰教与西非本土宗教的“私生子”。

马帝坚决反对在西非成立殖民政府主导下的马德拉萨，培养穆斯林精英，纯化伊斯兰教这一做法。事实上，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于20世纪初建立的马德拉萨，到30年代已经宣布失败。马帝认为，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育模式不适合西非伊斯兰教，西非穆斯林中真正会阿拉伯语，理解伊斯兰教教义的人很少，即使所谓的“毛拉”、马拉布特，大部分都不学无术，能认识全部阿拉伯语字母者已经算“有知识的人”，他们只是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为幌子招揽学生。以本土传统信仰为核心的这些人很难直正接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教育。企图以现代文明“教化”他们更是收效甚微，不是正确选择。因



① Paul Marty, Les Mourides d'Amadou Bamba. Paris, 1913.

② Paul Marty, L'Islam en Mauretanie et au Sénégal. Paris, 1916.

③ Paul Marty, L'Emirat des Trarzas. Paris, 1918.

④ Paul Marty, études sur l'Islam et les tribus du Soudan.

⑤ Paul Marty, L'Islam en Guinée : Fouta-Diallon, E. Leroux, Paris, 1921.

⑥ Paul Marty, études sur l'Islam et les tribus maures : les Brakna, E. Leroux, Paris, 1921.

⑦ Paul Marty, études sur l'Islam en Côte d'Ivoire, E. Leroux. Paris, 1922.

⑧ Paul Marty, études sur l'Islam au Dahomey : le bas Dahomey, le haut Dahomey, E. Leroux, Paris, 1926.

⑨ Paul Marty, études sur l'Islam maure : Cheikh Sid'a. Les Fadelia. Les Ida ou Ali, E. Leroux, Paris, 1916.

⑩ Paul Marty, études sénégalaises (1785-1826),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E. Leroux, Paris.

⑪ Paul Marty, Les tribus de la Haute Mauritanie, Comité de l'Afrique française, Paris, 1915.

⑫ Paul Marty, " Les touaregs de la Boucle du Niger " (en collab. avec le général Mangeot), in Bulletin du Comité d'é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no 1, 2 et 3, 1918, p. 88-213.

⑬ 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 (ANS), 19, G 1, Gov.- Gen. AOF circular, 15 January 1913.

此殖民政府最好让当地穆斯林保持“完美的无知状态”，这样既不至于费力干涉西非伊斯兰教，也有利于殖民统治。

对西非伊斯兰教的治理，他建议殖民政府应该放弃武力思维，采用更易于被穆斯林接受的统治方式。例如，在毛里塔尼亚的问题是既是如此。1909年法国人以武力占领毛里塔尼亚后，根本无力控制局势。以苏菲长老玛·艾敏（Ma el-Ainin）及其子希巴（el-Hiba）为首的部落拒绝接受法国的统治，甚至还向摩洛哥提出主权要求。摆在殖民政府面前有两条路：武力再征服和谈判妥协。在马帝的力主下，法国人以支持殖民政府的、颇有影响力的希巴的叔叔萨阿德·布（Saad Bu）作为调停人，并在适当让步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了毛里塔尼亚的危机。

马帝对西非的苏菲教团有精深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在穆里德教团的研究中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9—20世纪之交，穆里德教团迅速在塞内加尔兴起和发展，通过分析，殖民政府认为教团会威胁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宗教教团随时可能转化为力量巨大的反法机构，同法国人争夺花生种植的经济利益。殖民政府两次流放教团长老阿赫默杜·邦巴（1895—1902；1903—1907），反而增加邦巴的神圣性，助长了教团的发展。面对这个如日中天的教团，殖民政府一时不知所措。1913年，马帝写出一份关于穆里德教团的调查报告。^①该报告查清了穆里德教团的成长过程、宗教思想、仪式，分析教团内部各主要人物性格与气质，指出穆里德教团与其他苏菲教团的区别，即它是深受西非沃洛夫人宗教和风俗影响的宗教组织。穆里德教团的基本成员为非洲奴隶，生性平和、沉稳，他们选择阿赫玛杜·邦巴作为精神导师，是传统习俗与苏菲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的教团没有宗教极端主义倾向，也不会接受北非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综上所述，尽管穆里德教团发展迅速，它并不会给殖民政府带来威胁，法国人应该尝试与它共处和合作。马帝的这篇颇具说服力的报告仿佛送给茫然不知所措的殖民政府一盏指路的明灯，不再把穆里德教团看作威胁，而是逐渐利用穆里德教团为殖民政权服务。马帝的这本报告，推动殖民政府在处理塞内加尔伊斯兰教事务中从对抗向合作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是法属西非宗教政府中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转向。此后，共处与合作的策略逐渐推广到整个法属西非范围内可以合作的伊斯兰教。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非常实用的正确策略。



^① 后来该报告以《阿玛杜·邦巴的穆里德教团》为名公开出版。

在研究穆里德教团的基础上，马帝结合他对西非各地伊斯兰教的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的研究，提出“黑人伊斯兰教”（Islam noir）的观点。“黑人伊斯兰教”学说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特殊论为基础，构建非洲黑人地区伊斯兰教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体系。该理论以西非伊斯兰教研究为基础，然后扩展、应用到整个非洲黑人伊斯兰教，从撒哈拉以南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明显的苏菲主义特征等角度理解非洲伊斯兰教。“黑人伊斯兰教”理论以服务于殖民治理为最终目标。该理论认为，相对于北非伊斯兰教的极端、疯狂、好战等特点，本土化了的撒哈拉以南伊斯兰教则更为温顺，易于管理。

马帝还强烈建议加强对伊斯兰教的“科学”研究，以现代科学手段分析、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西非伊斯兰教，服务于殖民政府。在他的呼吁下，法属西非成立了以他为首的“穆斯林事务服务局”，负责关于伊斯兰教信息的收集与整理、阿拉伯文件翻译、当代伊斯兰教研究等工作。就此而言，马帝可谓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本人在伊斯兰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卷帙浩繁，洋洋大观，代表了当时非洲伊斯兰教研究的最高水平，且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三、结论

克洛塞、德拉夫斯和马帝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的学术经历非常相似，对西非伊斯兰教的认识与理解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他们的学术观点虽稍有差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形成的“西非伊斯兰教特殊论”，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黑人伊斯兰教”的概念。^①从克洛塞到德拉夫斯，已开始提出非洲伊斯兰教深受地方文化的影响的主张。他们还认为，基于西非众多文化各异的民族，伊斯兰教也呈现出各种类型。他们的观点受到殖民地高官，如庞帝的认同。马帝则

^① “黑人伊斯兰教”，是殖民时代法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法语叫“Islam noir”，“noir”在法语中是“黑色”的意思。他们提出这一概念来概括撒哈拉以南黑人地区的伊斯兰教，用以区别“阿拉伯伊斯兰教”。“Islam noir”在英语中用“African Islam”来表示，而不用“Black Islam”，因为在英语中“Black Islam”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在汉语中非洲包括北非和埃及，如果用“非洲伊斯兰教”来表示“撒哈拉以南的伊斯兰教”，不是太妥。汉语中“黑人”没有歧视的含义，因此我将“Islam noir”翻译为“黑人伊斯兰教”，而不是英语中的“非洲伊斯兰教”。当然，这里的“黑人伊斯兰教”仅就非洲大陆而言，不包括世界其他地区黑人的伊斯兰教。



以穆里德教团为具体事例，详细论证“黑人伊斯兰教”，结束了法国殖民政府对非洲伊斯兰教怀疑与不确定的时代。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当时西非宗教研究的最高水平。

从宾格、庞帝，到克洛塞、德拉夫斯、马帝，他们既是学者，更是官员，学者型的官员。他们的研究首先是为殖民政府服务的，因此他们研究以对策性研究为主。作为官员，他们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搞大规模调查，收集资料，这在当时条件恶劣的非洲，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作为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为后人收集了素材，积累了资料，开拓了道路。即使现在看来，他们的许多学术观点仍是真知灼见，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他们又比纯粹的殖民官员多一份人文情怀，这也是他们其中有人提出的政策建议经常不被采纳，并愤而辞职的缘故。无论如何，他们打开了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非洲伊斯兰教的先河，其学术贡献，值得后人景仰。他们之所以现在还被屡屡提起，主要不是作为政府官员，而是作为学者。

19—20 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对西非伊斯兰教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他们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教苏菲主义与苏菲教团、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穆斯林民族与非穆斯林民族、西非伊斯兰奴隶制度等方面，进而在“混合”伊斯兰教理论的基础上得出“黑人伊斯兰教”的结论，不但有效地指导了法国殖民统治，而且对后来乃至当前的西非伊斯兰教研究都有深刻影响。法国殖民学者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对西非伊斯兰教研究的第一次高峰，即使当代学者仍难以突破他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

德拉夫斯以西非万物有灵论制约伊斯兰教的建议，即使在当代世界仍有现实意义。殖民统治初期，法国殖民政府并不希望伊斯兰教在西非继续发展，不断对伊斯兰教采取多种的遏制手段。事与愿违，伊斯兰教则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困惑之余，以德拉夫斯为代表的殖民学者突然发现，原来殖民政府事实上在帮助伊斯兰教。法国人藐视西非本土万物有灵信仰，行政措施事实上也在摧毁万物有灵信仰，这不但为外来宗教的传播提供了信仰的空间，而且破坏了非洲社会抵抗伊斯兰教的天然免疫力。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殖民政府已与伊斯兰教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并未采纳德拉夫斯等人的建议，但是他们“以本土宗教抵御外来宗教”，从而保护地方传统文化的观点，在当前以强势宗教文化为底色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弱势文化的时代，仍值得人们深思。



have been done by scholars recently, especially Al Shykh Salim bin Bushra's comment on Ahmad Al-Shawq's poetry in praise to the Prophet and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Islam in Black Africa By Li Weijian(133)

This paper explores French scholars' studies on Islam in West Africa in Colonial times. It not only tries to introduce some scholars and their studies to show how those people based their studies on the field work thoroughly, but also they probed into almost all the pertinent fields of Islamic studies, including Sufism, localization of West African Islam, Muslim ethnics and non-Muslim ethnics, slavery in West African Islam and so on. Their most luminary academic contribution to Islamic studies was the theory of the Islam noir. Their studies were greatly conducive to French colony administration even scholars nowadays have been under influence of their conclusions.

An academic controversial case over hundred years By Ma Jing(144)

In 1892, both Ma Dingyuan, from Longzhou of Guangxi province and Zhou Mingde (from Chengdu of Sichuan Province) reprinted work of Ma Junshi, namely *Wei Zhen Yao Lue*. Zhou Mingde mentioned in the preface that Ma Junshi was man of "Qianlong Time". This statement has so great impact on later academics that scholars onward, without seeing the original copy of the book, brought their opinions on the statement and elaborated in a great deal, yet so many myth has been uncovered.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expound with some of those myths.

Islam Monthly and Islam Newspaper:the Integration of Islam Culture with indigenous Culture of Yunnan

..... By Xiao Jihong(153)

Yunnan is a place where multiracial people and multi-religions integrated and harmony each other. Islam was propagated in Yunnan since Ta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from the Yua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With this development,a distinctive religious culture of Islam had come into being in Yunnan Provinc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some scholars who had had far-reaching impacts on Chinese Islam. More important was when it came into modern times, the Islamic culture of Yunnan was flourished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indigenous cultures of Yunnan successively. These were all represented in publications and newspapers of Muslims at that tim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Dialogue: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Family code through a Marriage between a Muslim and a Christian

..... By Hong Wei(164)

With increasing marriage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believer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the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the divaricating of different religion believers are worth thinking about. Taking

